

梁启超与日语借词

朱 京 伟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笔耕不止，在身后留下了上千万字的著述。梁启超的文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使用的“新文体”，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概括梁氏“新文体”在句法方面的特征，而对“新文体”在词汇方面的特征不够重视。其实，梁氏的文体之新离不开当时盛行于世的“新名词”，而梁启超之所以成为使用“新名词”的先行者，又与他在日本长达 14 年的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本文的目的在于，弄清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以及他早期主要使用了哪些日语借词。

1. 梁启超著述的概况

李国俊先生在《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一书中对梁启超的著述情况作了如下概括：“在 1895 年以前，梁启超除创作了为数不多的诗词外，没有什么重要的著作。……梁启超的著述生涯实际始于 1896 年主撰《时务报》时。自那以后，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从 1896 年至 1928 年的 23 年中，梁氏总共撰述了约 1100 万字的巨著，就是说以每年撰写 33 万字的速度，持续 33 年”¹。梁启超的文名早立，30 岁时就有文集出版，在他生前问世的文集丛书等多达 20 余种，去世后的 7-8 年间又有 10 余种陆续出版。其中，梁启超去世后，由中华书局 1932 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是现存各本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梁氏文集，包括文集 45 卷和专集 103 卷，总共约有 920 万字。²

李国俊先生把梁启超的著述生涯分为 3 个时期，并对《合集》所收的作品进行了分类统计，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梁启超著述的分期与分类统计

时期	数量 字数	占合集 总字数 %	年平均字数	其 中		
				学术类	政论类	文艺类
1896-1911	453 万	49.3%	28.4 万	70 篇	182 篇	179 篇
1912-1917	74 万	8%	12.2 万	7 篇	81 篇	15 篇
1918-1928	393 万	42.7%	35.7 万	96 篇	47 篇	11 篇

1 李国俊（1986）p. 6。

2 同上 pp. 1-17。

第1时期(1896-1911)即辛亥革命以前的著述。从写作字数上看,约占梁氏生平著述的一半。梁启超任主笔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颇有影响的报刊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他在日本度过的14年亡命生活也几乎全在这一时期里。从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年,是日语词汇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时段。这段时间,梁启超正好身在日本,他既有阅读日文书籍接触日语词汇的环境,又有通过办报使用和传播日语词汇的条件。因此,梁启超在输入日语借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第2时期(1912-1917)是梁启超结束了在日本的亡命生活,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做官的几年。这期间,梁启超忙于政府和政党的社会活动,除政论文章仍保持了一定数量之外,其他著述大幅减少,是他生平留下文字最少的时期。从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时期,日语借词大量涌入汉语的过程已接近尾声,而梁启超回国之后,也失去了阅读日文书报、频繁接触日语词汇的环境,他在输入日语借词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然不能和上个时期相比。

第3时期(1918-1928)是梁启超远离政治活动,全力投入讲学和著述的时期。尽管他的几部传世的学术名著都成书于这个时期,但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清代学术以及史学和佛学,这类传统的国学著述对日语借词的需要不多。因此,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已经不大可能在输入新的日语借词方面有所作为。

2. 词语调查的范围

要弄清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调查的重点应放在梁启超著述的第1时期(1896-1911)上,尤其应当关注的是梁启超早期的著述活动。梁氏的早期著述主要发表在《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大体情况如下:《时务报》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至1898年8月停刊为止,历时2年共发行69期。梁启超作为主笔,在该报上共发表过40篇文章,其中有39篇收入《合集》³。《知新报》1897年2月创刊于澳门,梁启超是撰稿人之一,在他参与戊戌变法之前,曾在《知新报》上陆续发表过11篇文章,其中有10篇收入《合集》。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被迫出走日本。他到日本后仅两个多月,就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清议报》自1898年12月创刊至1901年11月停刊,历时3年共发行了100期。梁启超在该报上共发表了75篇文章,其中有66篇收在《合集》之中。《清议报》停刊之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自1902年2月创刊至1907年12月停刊,历时5年多共发行了96期,其间梁启超共发表文章180篇,收入《合集》的有110篇。

在考察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时,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他赴日前后在用词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梁启超赴日之前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时务报》和《知新报》上,而他赴日之后的文章主要刊登在《清议报》上,因此,这3个刊物应是本文进行词语调查时的首选资料。至于《新民丛报》,虽然梁启超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也使用了许多日语借词,但由于《新民丛报》的创刊时间晚于上述3个刊物,对考察梁启超何时开始使用日语借词的帮助不大,暂不列为词语调查的对象。

3 由笔者参照李国俊(1986)所收的梁文篇名统计,只计文章篇数,不计连载次数,以下同此。

此外，夏晓虹教授近年对梁启超的著述作了新的发掘和整理，把没有收进《合集》的梁氏文章汇编起来，出版了《〈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005）一书。但通览全书后发现，梁氏佚文中没有比《时务报》创刊更早的文章，论内容也不如《合集》收有的文章那么重要。因此笔者认为，以《合集》为文本资料便可以达到预定的研究目的。不过，《合集》中的文章只是按照年份顺序大致排列的，没有标明每篇文章发表的准确时间。在这方面，李国俊先生编著的《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利用这本书不但可以把梁文的发表时间精确到某月某日，同时还可以纠正《合集》在年份上的一些讹误。

3. 词语的抽取和分类整理

在确定了词语调查的资料之后，需要从梁启超的文章中具体抽出那些有可能是日语借词的词语。为此，笔者在梁启超所用的众多词语中，把汉语和日语共用的“中日同形词”作为抽取的对象。但这只是抽取的最大范围，因为“中日同形词”中既包含近代以来汉语从日语输入的词，同时也包含历史上日语从汉语输入的词，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难以直观辨认的。为了全力找出近代以来汉语从日语输入的“日语借词”，应重点关注和抽取那些带有专门术语性质、在清末时表达新概念和新事物的词语，因为在专门术语和表达近代新概念的词语方面，汉语输入日语词汇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以上的原则，笔者从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共抽出相关词语 887 个，按年份和词语字数等进行整理之后，其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从 3 刊物（1896—1901）中抽出的梁启超的用语

	2 字词 (597 词 / 67.3%)				3 字词	4 字词	5 字词	合计 (%)
	有典	新义	无典	未收				
1896	32	3	12	4	8	1		60
1897	47	9	16	10	13	4	1	100
1898	28	8	14	1	4	7		62
1899	208	25	91	18	95	86	3	526
1900	4	1	5		5	2		17
1901	25	5	25	6	30	30	1	122
合计 (%)	344 (57.6)	51 (8.6)	163 (27.3)	39 (6.5)	155 (17.5)	130 (14.6)	5 (0.6)	887

表 2 显示，不同年份之间的词数相差颇为悬殊，这与梁启超每年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具体而言，《时务报》是 1896 年 8 月创刊的，梁启超初期的文章尚未脱去旧式文言的框框，因此值得抽取的词语较少。1897 年是梁启超在文章上渐入佳境、活跃多产的一年，所抽出的词数也呈上升趋势。1898 年，梁启超先后参加了保国会、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而后又出走日本，一年中动荡不定著述不多，所抽出的词数也随之回落。进入 1899 年，梁启超在日本安顿下来，开始全力投入《清议报》的编辑和发行。他编纂《和文汉读法》，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对通过日文书籍了解“东学”和“西学”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同时还在著述方面积极引进日语词汇，逐渐形成了新的文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年的抽取词数大大超过了其他年份，达到了最大值。1900 年，梁启超为筹措活动经费远赴檀香山和美洲，还在澳洲住了半年，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旅途中度过，著述不多，所以抽取

到的词语也很少。1901年梁启超回到日本，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多，抽取的词数也再次回升。

如表2所示，笔者是按照词语的不同字数进行分类和整理的。二字词是汉语词的基本单位，不仅数量最多，还具有构成三字词、四字词等的构词功能。三字词一般是由二字单位和一字单位组合而成的(2+1或1+2)，而四字词一般是由两个二字单位组合而成的(2+2)。对于二字词，我们需要查明它们的词源，区分是中国造词还是日本造词。对于三字词和四字词，我们主要关注它们在构词上的特点，以及在二字词基础上形成新概念的情况。以下将按照表2所示的框架，对梁启超使用得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等分别加以考察。

4. 梁启超著述中的二字词

笔者从《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等刊物中共抽取到887个词语，其中二字词有597个，占全部抽出词的67.3%。对于这些二字词，需要通过检索《汉语大词典》(罗竹凤主编)来初步判别它们究竟是中国造词还是日本造词。如表2所示，检索的结果可以分成“有典”“新义”“无典”“未收”等4种情形，以下分别加以探讨。

4.1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所谓“有典”，是指可以从《汉语大词典》中查到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属于这类的词数量最多，共有344个，占二字词总数的57.6%。从总体分布上看，通用性强的一般词汇最多，而在专业术语中又以人文科学类的词居多。举例如下：

(1) 一般词汇

爱国 保全 比较 程度 丛书 创设 村落 对照 反动 贩卖 方法
分配 根性 公众 规则 贵族 国库 厚生 积累 价值 教育 进步
近代 经营 开化 论说 膨胀 人类 上等 时代 实学 世界 事件
事业 手段 团结 退步 下等 小学 形态 中等 状态

(2) 人文科学

变革 裁决 党派 独立 封建 改革 公法 国家 国民 国势 国体
国政 货币 立法 流通 垄断 伦理 判决 权力 市场 私法 私有
岁出 岁入 条约 统计 卫生 文明 选举 元首 政体 政权 种族
自由 自治 资本

(3) 自然科学

大陆 地球 镀金 风化 高原 恒星 化学 平原 气体 物质 行星
遗传

(4) 军事词汇

兵器 海军 军备 军队 陆军 骑兵

从造词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有古汉语出典的词是中国造而不是日本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还有不少疑问需要澄清。比如，这些词是否一直在汉语中使用？梁启超在清末时期使用这些词，是基于他的古汉语功底，还是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后才使用的？

再如，从词义上看，虽然这些词所表达的基本概念从古到今变化不大，但与古汉语相比，毕竟在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语境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例如：在古汉语里，“世界”一词的原义是“宇宙”或“人世间”，现在所指的范围则是“全球各国”。“选举”一词的原义是“选拔贤能”，而现在用于政治生活方面，专指“通过投票等方式选出领导人”。“流通”一词原来泛指“通行无阻”，现在用于金融领域时，特指“商品货币的流转”。其他如：国民、国体、立法、垄断、资本、市场、价值、封建、自由、文明、卫生、独立等许多词，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追寻这类现象发生的源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利用这些古已有之的汉语词去表述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把这些词纳入了近代以后的新的学科领域。在此过程中，日本人并没有创造新词，但客观上却引发了这些古汉语词的词义变化。对于这种小幅度的词义调整，笔者认为：词义的演变是语言的普遍规律，用古汉语词去对应西方概念时不一定非要产生新义。我们应当承认日语对这些汉语词的词义确实有过影响，但只要基本词义没有发生变化，就表明古汉语的原词是可以容纳现代概念的，应当把小幅度的词义调整视为原有词义的延续和扩展。这样定义也是为了和下述产生新义的二字词相互区别。

4.2 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所谓“新义”，是指有些二字词产生了与古汉语原义明显不同的新词义。这里所说的“新义”，主要是指利用古汉语词去对译某些西方概念时所发生的词义变化。就其特点而言：一是词义变化在短时期内实现；二是词义变化的幅度大，原有的词义往往被新义完全取代。例如，“社会”一词的古汉语原义是“社日的集会”或“由志趣相投者组成的团体”，由于日本在明治初期用“社会”去对译英语的 *society*，从而使“社会”产生了现代的新义⁴。现代汉语的“社会”的词义是吸收了日语的新义而形成的，而且古汉语“社会”的原义已经消失。梁启超赴日的时间早，旅日的时间长，而且勤于著述，因此很有可能率先将日语中产生的新义运用到汉语中来，这正是我们关注梁启超著述的主要原因。在梁启超的用语中，可以视为产生新义的词共有 52 个，占二字词总数的 8.6%。举例如下：

参政 大学 代表 代理 反对 风潮 感情 革命 公民 公权 关系
 观念 归纳 过渡 集会 经济 科学 理论 恋爱 历史 民主 起点
 权利 社会 世纪 思想 王国 卫生 问题 宪法 现象 校长 演说
 艺术 营业 影响 预算 运动 直接 治安 中学 主权 主体 总会
 组织 作用

4.3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所谓“无典”，是指《汉语大词典》中没有列出任何书证，或者只有晚于清末时期的书证的词。在梁启超的用语中，属于这类的词有 163 个，占二字词总数的 27.3%。经检索日本出版的『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发现这些词在日方辞书中的书证往往早于中方辞书的

4 参见齐藤毅（1977）的第五章「社会という語の成立」。

书证。从中日双方在书证年代上的时间差来看，这些无古汉语出典的词有可能是从日语进入汉语的“日语借词”。举例如下：

财产 财政 裁判 担保 担任 德育 抵抗 帝国 定义 动机 动力
方针 高潮 高等 高度 改良 改造 个人 革新 古代 广义 国防
国会 国际 国债 活剧 纪念 简单 间接 结论 进化 警宫 警卫
剧场 军舰 决算 开幕 客体 扩张 理想 立宪 领地 流域 留学
论据 美术 迷信 民法 民权 民选 模型 末期 目的 年度 排除
普通 潜力 权限 缺点 人员 任期 商界 商业 实业 属地 特权
特色 特性 特质 体操 体育 提要 同化 投票 团体 吸引 系统
宪兵 宪政 现状 星团 星云 宣战 学会 学派 学说 血管 压制
要素 野蛮 有机 渔业 元素 原料 原理 原则 远东 占领 哲学
政变 政策 政党 殖民 制裁 秩序 智育 重视 租界

当然，辞书书证的有无和早晚并非最可靠的依据，就《汉语大词典》的现状而言，越是近现代的书证，其可信度越低。因此，需要对这些词作进一步的词源考察，才能最终确定哪些是日语借词。其中有些词已经完成了个案研究，可以确定是日本人在明治时期创造的新词，如：裁判、德育、定义、个人、国际、客体、美术、目的、哲学、殖民等。还有一些词，如：会社、赁银、汽车（“火车”义）、祝典、组合等，显然是梁启超当时照搬使用的日语词，日后没能在汉语里固定下来。此外，还有一些可能是19世纪来华传教士首创的词，如：表面、国旗、角度、面积、全权、热力、压力、议会、议员、议院、原质、质点、宗教等，如能最终证明是来华传教士的首创，自然不应归入日语借词之列。总之，在“无典”词之中最有可能发现日语借词，要最终查明梁启超使用过哪些日语借词，就必须对无古汉语出典的词进行彻底的研究。

4.4 《汉语大词典》未收的二字词

所谓“未收”，是指《汉语大词典》没有作为词条收入的二字词。这类词有39个，仅占二字词总数的6.5%。举例如下：

差别 产儿 产物 产业 定率 段阶 工学 公性 共产 关税 过劳
竞争 拒力 决斗 绝望 君权 良性 米国 米洲 免疫 纳税 强权
强制 权理 群学 商法 商学 税务 私权 特别 洋员 治者 株式

至于没有收入辞书的原因，有的词是梁启超当时照搬使用的日语词，如：定率、段阶、米国、米洲、株式等。还有一些可能是梁启超自己的造词，或是在清末流行一时的词，最终没能在汉语里存活下来。如：公性、拒力、君权、权理、群学等。除此之外，其余的大部分词都是汉语仍在使用的，应该说是《汉语大词典》的疏忽遗漏。这部分词和上述“无典”的词性质十分相近，同样需要通过考证才能确认它们是日语借词。

5. 梁启超著述中的三字词和四字词

梁启超所处的清末时期，是汉语从文白分离走向文白合一的重要发展时期。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在当时的书面语中，一字词仍旧偏多，二字词的增长缓慢。至于三字词和四字词，除了传统的惯用语和成语之外，数量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文风被时人称为“新文体”，这与他在文章中大量使用二字词、三字词和四字词等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文章中多用二字词、三字词和四字词，不但可以使概念表达更为清晰，还可以起到扩充句子成分和延伸句子长度的作用，从而促使传统的文言文逐步接近白话文。笔者从梁启超著述中抽出的三字词共有155个，占抽出词总数的17.5%。举例如下：

爱国心 白种人 保守党 博览会 财政权 财政学 裁判官 裁判所 参政权
常备兵 出口货 大统领 代议士 单行本 独立性 封建制 根据地 工商业
合众国 教科书 进口税 居留地 离心力 脑气筋 欧米人 陪审官 清教徒
上议院 文部省 有力者 原动力 殖民地 植物学 资本家

从梁启超使用的三字词中，可以发现构词方式上的一些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利用类词缀构词方面。举例如下：

一党 保守党 反对党 改革党 革命党 共和党 急进党 进步党 自由党
一法 间选法 会计法 收税法 征兵法 直选法
一家 理论家 理学家 收藏家 天演家 哲学家 政治家 资本家 宗教家
一界 经济界 文学界 艺术界 哲学界 政治界
一力 繁殖力 国民力 竞争力 离心力 资本力
一权 财政权 参政权 警察权 立法权 司法权 特立权 行政权 选举权
自治权 自由权
一性 别择性 独立性 公共性 建国性 冒险性 忍耐性 永静性
一者 被治者 劳动者 劳力者 统治者 消费者 有力者 执政者 统治者

在清末的汉语书面语中，很少用类词缀的方式构成三字词，即便能找到零星的词例，也没有形成系统的造词能力。而在明治时期的日语里，这种类词缀的构词方法却十分常见。因此可以推测，梁启超是在日语构词方式的影响之下，才开始利用类词缀构成三字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启超的用例中，除了从日语照搬来的三字词之外，还有一些是日语所没有的三字词，如：天演家、特立权、自由权、别择性、建国性、冒险性、忍耐性、永静性、劳力者等。这表明梁启超已经在有意识地使用类词缀造词了，他有可能是把类词缀的构词方式引入汉语的先行者之一。

再来看看梁启超使用的四字词。笔者共抽取到130个四字词，占抽出词总数的14.6%。四字词中的大多数是梁启超照搬来的日语词，这些词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出版物中经常出现。另有少部分或是梁启超经手修改的，或是清末汉语中的四字词。日语四字词的构词特点是：绝大多数都是由两个二字词（或称二字语素）组合而成的2+2形式，而且参与构词的两个二字词一般都可以单独使用（如：地方+团体、东洋+思想、生存+竞争）。只有少数二字词不

能单独使用，由它们构成的四字词往往不是日本人的造词（如：代议宪法、代议政体、新陈嬗代、物竞天择）。举例如下：

半自由国 兵役义务 大陆市场 大学教授 代议宪法 代议政体 地方团体
地方自治 东洋思想 独善主义 封建割据 封建时代 高等学校 公民社会
共和政治 国会议员 国民竞争 进化主义 劳动社会 女权革命 三权分离
生存竞争 师范学校 思想言论 同盟罢工 文明进化 物竞天择 新陈嬗代
优胜劣败 政治小说 治外法权 中央集权 中央政府 尊王讨幕

笔者抽出的四字词中还包括：参政之权、自由之权、资本之家、爱国之心、无限之性、有限之性、自由之性、教科之书、文明之国等一些词。在日语中这些词原本是三字词，梁启超按照当时汉语的语感添加了“之”字，似乎表明他当时对使用“参政权、自由权、教科书”一类的三字词还是有所犹豫的。

从梁启超使用的四字词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在日语的影响之下出现的新的构词方式，主要表现在围绕同一个二字语素进行系列性构词上。例如：以“社会”作为表达上位概念的二字语素，在和其他二字语素组合之后，便可以构成“公民+社会、劳动+社会、下等+社会”等一系列表达有关“社会”的下位概念。梁启超著述中的其他用例还有：

一革命 女权革命 宗教革命 政治革命 资生革命
一竞争 国民竞争 经济竞争 生存竞争 自由竞争
一社会 公民社会 劳动社会 下等社会 下流社会 乡村社会
一时代 封建时代 过渡时代 黑暗时代 石器时代 野蛮时代
一政体 代议政体 共和政体 立宪政体 民主政体 专制政体
一政治 共和政治 贵族政治 合众政治 君主政治 立宪政治 民主政治
庶民政治
一主义 保守主义 帝国主义 独裁主义 独善主义 公共主义 功利主义
共和主义 国家主义 兼善主义 进化主义 民主主义 平等主义
破坏主义 强立主义 社会主义 世界主义 实质主义 庶民主义
文弱主义 厌世主义 专制主义 自由主义

传统的汉语四字词缺乏这种成系列的构词方式，应该说，这种构词方式最初是在日语的影响之下才在汉语里出现的，汉语一旦接触到这种构词方式，便很快形成了独立造词的能力。梁启超在照搬日语四字词的同时，也比照日语的形式经手修改或自创了一些四字词（例词中用横线标出者）。四字词的构词稳定性有强有弱，稳定性较弱的往往就解体消失了（如：国民竞争、经济竞争），而稳定性较强的可以存活至今（如：生存竞争、自由竞争）。对于四字词，只要有足够的稳定性，并有日方资料作为词源的佐证，就应该视为日语借词。

参考文献

- 齐藤毅（1977）『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講談社
李国俊（1986）《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 狭間直樹（1999）『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
- 郑匡民（2003）《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
- 夏晓虹辑（2005）《〈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 石云艳（2005）《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据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版影印）/《清议报》（全六册），中国近代期刊汇刊，中华书局，1991 /《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1994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小学館，2000-2002